

论明清福州城市发展及其重商习俗

徐晓望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明清时代福州的工商业有很大发展, 城市扩展很快, 五口通商前后, 福州仅次于广州是东南沿海排名第二的城市。福州人以工商为生, 养成了重视商业的习俗, 他们为了谋生跑遍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大小城市, 各地的三山会馆是他们经商成功的见证。福州人勇于海外探险, 富有开拓进取精神。

关键词: 福州; 城市; 明清; 重商习俗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821(2008)01-0034-06

明清时代的福州手工业发达, 商业繁荣, 人口众多, 是东南著名的工商城市。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 福州人形成了有别于内地的重商习俗, 他们以经商为荣, 儒商并举, 向海外发展, 是中国海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明代福州城市的发展

福州位于闽江下游, 东为大海, 交通便利, 历来为东南名城之一。明代《福州府志》论福州: “在八闽为闽中, 地平衍, 西北控瓠, 剑, 注众溪之流, 东南负大海, 环以崇山, 带以长江, 气恒燠少寒。厥土黑壤, 厥田中下宜稻, 亩岁再获, 其高田间种麦, 土瘠。民勤于治生, 田则夫妇并作, 居市廛者, 作器用精巧, 鱼、盐、果实、绩纺之利颇饶。七郡辐辏, 闽越一都会也。”^{[1](卷7, P102)} 这一段文字是相当精练的概述。

明代的福州是“山海奥区, 五方杂处, 膏壤衍而生齿繁, 东南一大都会也”^{[2](卷10, P1)}。明初福州筑城, “广袤方十里, 高二丈一尺有奇, 厚一丈七尺, 周三千三百四十九丈”^{[3](P79)}。晚明来访的西方人说“城市极壮丽, 特别靠近城门, 大得出奇。城门用铁包着。门屋和楼塔建在高处, 其较低部分用砖和石筑成, 和城墙相称。城墙上面的建筑物用木头构造, 一层又一层, 有许多层。他们的城池坚固, 是因为有高大的城墙和壕堑”^{[4](P87)}。福州城的建筑一向闻名于世, 闽县知县陈敏曾说: “礼制榜文庶民房舍不得过三间五架, 今福州街市民居有七架、九架, 其架或过于五, 而一间、二间, 其间不至于三。”这是说福州的民居跨

度较大, 民间房子便有七架或九架房梁^{[5](卷153, P6)}。福州的房屋多为木头建筑, “房屋多用板障, 地平之下, 常空尺许, 数间相通, 以妨湿气。上则瓦, 下布板”^{[6](卷9, P230)}。谢肇淛说福州市, “一则民居辐凑, 夜作不休, 二则宫室之制, 一片架木所成, 无复砖石”^{[6](卷4, P94)}。这说明当时的福州主要是木构建筑。有名的“三坊七巷”云集全省士大夫的精华, 其建筑自成风格。福州镇海楼高大宏伟, 是八闽最壮观的建筑。其余各类公署、寺院, 都以雄伟壮丽著称。当时的西班牙人描述福州的衙门: “其中一座的大门口, 有一个立在四十根柱子上的塔, 每根柱子是一根石头, 各有 40 掌或 40 拃长, 宽或周为 12 我们许多人都实地测量过。此外, 每根都那么大, 看来很难制作。它们是带棱角的, 颜色、长度和宽度都差不多, 彼此没有什么不同。这件物品令我们都赞叹不已。”他们评论福州: “福州城很大, 有内外都用方石筑成的高大城墙, 从城墙的宽度看, 中间是实以泥土, 了望楼盖瓦, 有整齐的走廊, 里头可住人。他们用的梯级, 修得很平坦, 人们可以骑马上下, 他们常这样做。如前所述, 街道是铺平的。有大批的商贩, 各人在自己的店门挂一块大牌子, 写明他出售何种商品。手艺人也写明他的行业。市场不小, 售卖的物品极其丰富。城市建在水上, 许多条河流经过它, 河岸是倾斜的, 很宽阔, 作为城市的街道使用。河流上有各种木桥和石桥, 和街道一般高, 不妨碍船只来往。河道很宽, 在河流通过城池的地方, 墙上有拱门。他们的

收稿日期: 2007-11-25

作者简介: 徐晓望(1954-), 男, 上海人,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巴劳(一种小船,原注)驶来驶去,那是他们的一种船,仅在白天行驶。晚上关闭拱门,把所有的城门都关上了。这些河流和船只使该城变得十分高贵,好像它是另一个威尼斯。房屋都很矮,但盖得很好,除售货的屋外,并不高。看到这些城市那么大,感到惊奇,原因在于,如我所说,房屋造得很矮,占了大面积的地盘。”明末西班牙人估计:福州城有 15 万户人家^{[7] (卷 3 P80, 256)}。

明代的福州城可分为两个部分,南门兜以北是旧市区,拥有宣政街、南街、新街、后街、西门大街、北街、北门后街、东街、仙塔街、开楼门街、汤门街、馆前街等 12 条街道。除了商业街外,城内也流行集市贸易,明中叶弘治年间,福州城里只有侯官市,迨至晚明,福州城内增加了还珠门市、安泰桥市、土街市、闽县前市、相桥市、怀德坊市等 6 个市。其中,东街为福州最繁华之地“东街,达于东门,通衢数里,为城中冠”^{[8] (卷 3 P12)}。明代的福州以商业城市闻名东南,明代的诗人王恭咏福州:“七闽重镇旧繁华,九陌三衢十万家。”^{[8] (卷 3 P17)}何乔远说:“西望郡城,列雉数千,市廛闐闐,丽谯浮屠,台门府寺,释老之宫,辉霍崇丽,斗出其间。”^{[3] (卷 1 P23)}

明代台江市区的发展。迨至元末,福州城市范围大至在福州城的城墙之内,即相当今日福州的鼓楼区。明代初年所筑城市将其囊括于内,其南端约在南门兜。明代初年,福州南门外尚是一片水网地带,现在是台江市区的地方,当年被水道分割为数块沙洲,例如:帮洲、苍霞洲、鸭姆洲、义洲、楞严洲,这些沙洲上长满了荒草,是鸥鸟栖息之地,只有少数地方有居民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河口。河口在福州东南部,约离南门二三里路,今为国货路以南。河口以南,有较宽的河道直通闽江,可以通行海船,因而,河口自然成为福州的码头。早在宋代,官府即在这里设置“临河务”,对往来商船进行抽税。明代中叶,朝廷确定福州为唯一的对琉球贸易口岸,而河口又是福州城外大船所能靠近的最近一个码头,所以,河口很自然被确定为安置琉球使者的柔远驿所在地,而后又成为制造册封琉球大舟的工场所在地,在这里云集了大量官员、工匠、士兵、外商,对福州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宏治间,督舶邓内监始凿新港,以通大江,便夷船往来,土人因而为市。”^{[9] (卷下 P66)}由于这一带有大量的贸易机会,河口的“市”当然是不容忽略的。

沿江另一个发展起来的市区是以钓龙台为核心的帮洲一带。钓龙台是古代福州河船转驳的一个码

头,相传汉代来自朝廷的大臣封闽越王无诸于此。唐代翁承赞入闽封闽王,也是由钓龙台附近进入福州内河,然后到安泰桥一带。由于这一原因,帮洲一向是福州的一个贸易点。明代闽江上游的商人聚集于此,形成上航街(今名上杭街)与下航街(今名下杭街),当时又名南台街“俗名潭尾,委巷甚多”。据万历《福州府志》的记载,潭尾街有潭尾市,这也是一个热闹去处。河口与帮洲这两个贸易点的发展,将福州市区向南推展。中亭街至少在明中叶已出现在福州南部“中亭街,自扬威坊至万寿桥数里,居民鳞次”。中亭街的商业也相当兴盛,当地有一个“中亭市”;在中亭街的江边过桥,桥的对岸是仓山,又名藤山,藤山之下有下渡街“恒数里皆民居”,从福州南门外街道的情况来看,明代福州的市区实际上向南延伸了 10 多里。以上福州南门外有:中亭市、南台街、潭尾市、下渡街等四个街市。这此街市头尾相联,形成一条长街,晚明王世懋说:“由福之南门出,至南台江,十里而遥,居民不断”^{[10] (P2)}。可见,这段约有十里路之遥的路程已成为街区。

除了向南发展外,明末福州向东、向西,都有一定拓展。福州的东门外有钵头街,一直“达东岳庙前”。东岳庙在古代是城市最重要的庙宇之一,前来烧香的人很多。

如果说福州城向东发展较有限的话,福州城向西发展,则是非常突出的。明代福州向西部的拓展与大桥的修筑有关。在南台大桥修筑以前,从上游来的船只可以直达台江卸货,但在南台大桥(今解放大桥)修成以后,桥下便不再能过船只。按,南台大桥一带河流急湍,为了修桥,工人在河底填了很多石头,形成一条石梁。所以,大桥修成后,桥底便不能通航。南台大桥修于元代,这是福州水路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南台大桥的上游,为了连接洪塘与福州,在明代后期修了洪山桥,洪山桥修成后,上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钓龙台一带,因而许多船只就在洪山桥与洪塘停靠,这使这两个地方成为市镇。明代福州的政治中心在省府路一带,从其附近往西,有鼓东路与西洪路,西洪路当时被称为新亭街,该街一直向西延伸,抵达洪山桥与洪塘市。“洪山桥在闽城西十里许,截江飞虹梁,蜿蜒百仞,其雄丽坚好,甲于一郡。……居人贸易其上,建亭翼然相属,过者不知其为梁也。”^{[11] (卷 27 P291)}明人论洪塘附近的洪山桥:“以通洪塘名。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12] (卷 23 P78)}可见,洪山桥是江船与海船的交汇中心之一。洪山桥过去是洪塘市,“洪

塘街 沿江居民裹数里”^{[13] (卷12 P-7)}。洪塘市在福州西郊的闽江边上,是上游船只进入福州登陆的码头,“洪塘至福州二十五里。凡雇船装人者,则抽稍工银二钱,装果子抽客人二钱。装果子抽客人二钱,装果子稍工扯牵处可上船,宜就此余米、买柴、菜、油、盐、酱、醋。自此至浦城”^{[14] (下卷, P15-16)}。这条史料表明:洪塘是福州与上游诸城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市场,由福州到上海的商船多从这里发船。实际上,上游运来的商品也多在洪塘登岸。董应举说:“上府粟聚于洪塘”^{[15] (说米禁, P15)},就是说,上游来的粮食都在洪塘集中贸易。洪塘还是福州往西驿道的起点,其下是下坞街“接洪塘街,达芋原”,“芋原街,有驿,旧怀安,今属侯官”。若将洪塘街与下坞街、芋原街连在一起看,这是一条数里长的长街^{[13] (卷12 P-7)}。以上福州市西门外有新亭街、洪山桥、洪塘、下坞街、芋原街等5个街市。

总的来看,明代福州商业的发展是明显的。明代前期,福州城内外仅有侯官市、洪塘市、南台市等三个市场,但到了明代末年,福州城内外的街市数量大有发展。至少有21个市镇,这些市镇后来都成为福州市区,将其与宋代的福州市区相比,可知其在南面、西面都有较大的扩展,它已经不是旧城墙范围所能容纳的了。这表明福州城在晚明的商品经济浪潮中有较大的发展。

二、清代福州城的发展

清代的福建领有台湾,作为福建的省会,福建沿海、山区与台湾的繁荣,使福州城的工商业有更大的发展。明清时期,福州已是一个有数十万人口城市,明清之际,唐王抵达洪塘,“自洪山塘抵城,迎驾人数十万”^{[16] (P4)}。乾隆年间林希五说:“附省居民,不下数十万家,加以四方往来杂处之众。”^{[17] (卷上, P4)}这些史料都说明福州有数十万人口。但是,对于福州的具体人口,一向没有准确数字。1904年左右,日人佐仓写的《闽风杂记》估计,福州城应有六七万户,倘若每户以五口人为计,则为30万至35万人。而《闽县乡土志》载有闽人谢颂品的估计:“计城厢居民约四十万人。”^{[18] (P267)}此前还可找到一个外国人的估计数,此人于道光年间调查福州,他说:“就福州筑有房屋的地区而言,大约比宁波大一倍,比上海大两倍,比厦门大四倍。据我所知,福州人口最低估计在500 000人以上。我个人认为可估计为600 000人。”^{[19] (第1卷, P395-597)}在明代还有西班牙人估计福州有十五万户人家。按中国古代的城市较少大楼,大多数是平房,而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城市多为楼房,所

以,欧洲人按其习见城市面积来估算城市人口,一般会多估中国城市的人口。我们若以日本人与闽人估计数为据,晚清的福州城约为30万—40万人上下。晚清的中国沿海城市,上海有待兴起,大连与烟台、青岛都在发展中,宁波、汕头只是一个小城市,东南沿海城市以广州最大,福州其次,上海超越各城市后,福州排在第三位,可见,当时英国人将其列为五口开放城市之一,是有其原因的。

构成市区核心力量的是各类商行,以牛皮行来说,据《闽产录异》一书,福州的皮革、角器、骨器都有自己的商行,“福州南台牛皮为一行、鞣鼓为一行、马革为一行、皮箱为一行、角器为一行、牛骨为一行、骨货为一行。”这些商行以统一价格批发各种产品,福州行商将它们运销各地,其中,牛角梳“盘运最广”。当时福州的制烟业也十分有名,《闽县乡土志》追忆:“太原王,明季时有王朋兄,自莆田贩烟来,遂以创售炒烟为世业,族聚最盛。”“朋兄姓王,莆田人,贩烟到此,逢霉以油炒之,转变芳美。销售最广,今兴义境王大盛炒烟庄是也。”^{[18] (P179)}郑丽生的《闽广记》也有记载:“朋兄烟,福州特别烟丝有二种,一为厚烟,一为炒烟,皆以管吸之。炒烟俗呼朋兄烟,创自清初。相传太原有王朋兄者,因避流寇之乱,于顺治七年,辗转入闽。时菸叶方从海外输入,嗜者少,价甚贱。朋兄从泉州、兴化转贩烟丝来榕,糊其口,一日天雨,烟丝为屋漏所湿,极懊丧如。置釜中焙干。不意香味倍佳,大利市,遂设肆于下渡,标榜曰:王大盛炒烟。……其烟吸时易燃,而烟灰弃地即灭。无引火之虞。最为农工及船户所喜,畅销于沿海各县,亦远至北京,渐起家。”^{[20] (卷2)}以上有关王朋兄的籍贯有两种记载,一者说其莆田人,一者说其太原人。按王氏家族有两大堂号,其一为太原王,其二为琅琊王,福建的王氏家族多自诩为太原王,他们在其门楣上常会刻上堂号。王朋兄家族自称为太原王,世代相传,后人遂以为其祖先为太原人。其实,王朋兄应为莆田人。他于明末在福州发明炒烟,而后盛行天下。因王朋兄是炒烟的发明者,所以,福州王大盛炒烟在清代享誉300余年。油炒的烟丝燃烧速度快,且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所以,一旦出现,大受欢迎。清代“福烟”之名享誉天下,与其有关。

各地来到福州的商人都建立他们的会馆,其中以南台的各地会馆为多。据今人调查,明清时代,南台市区拥有26座各县会馆,即:

建郡会馆,位于上杭路;周宁会馆,位于上杭路;
浦城会馆,位于上杭路;绥安会馆,位于上杭路;

南郡会馆 位于上杭路; 泰宁会馆, 位于上杭路;
盱南会馆 位于上杭路; 寿宁会馆, 位于上杭路;
轩南会馆 位于上杭路; 兴安会馆, 位于下杭路;
南郡会馆 位于下杭路; 延郡会馆, 位于延平路;
汀郡会馆 位于延平路; 汀洲会馆, 位于延平路;
永福会馆 位于三保街; 宁德会馆, 位于茶亭街;
福安会馆 位于茶亭街; 三山会馆, 位于横街巷;
闽清会馆 位于新闽街; 尤溪会馆, 位于潭尾街;
福鼎会馆 位于高顶路; 永德会馆, 位于高顶路;
福清会馆 位于福清路; 玉融会馆, 位于福清路;
古田会馆 位于吴厝埕; 霞浦会馆 位于台江坞埕
泉美会馆 位于台江

以上每一座会馆的背后, 都有大批商人, 若平均一座会馆代表着 100 名商人, 26 座会馆说明南台至少有三二千外地商人, 加上本地商人及服务业的各色人员, 当时南台的繁荣可想而知。清代初年的许旭将福州与苏州比较: “福州自城南还珠门抵南台二十里 百货填集 珍奇充轍 触目灿烂 比之阊门 何啻几十倍! 闽中子女玉帛 羽毛、齿革 无不甲于天下。” “闽中千家万户 烟火相望 庶富如此” [21] (P4、P27)。道需为霖说 “福州为八闽省会 人物殷盛 车马骈阗。” [21] 五口通商后, 南台的发展尤为突出, 尹继美《闽游纪略》提到: “南台, 地为海舟泊处, 百货妓女丛集”。百一居士的《壶天录》说: “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 烟户繁盛, 茶行鳞次, 洋粤商人集贾于此, 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 后洋里、田中街之名。皆闾閻崇宏 熙攘接踵。”

三、明清时期福州的重商习俗

生活在福州这样一座商业城市, 明清时期的福州人大多以工商业为生, 正如《松窗梦语》所说: “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 以江浙为藩篱, 东南抱海, 西北联山, 山川秀美, 土沃人稠。地饶荔枝橘柚, 海物惟错, 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 多贾治生, 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 被服不足自通 虽贵官巨室, 闾里耻之。故其民贱畜而贵侈。” [22] (卷4 P84)。在这种风气里, 商人成为各阶层最为羡慕的对象, 各阶层的人都拥入商人阶层, 至于官僚退役后经商, 则是明代普遍的现象, 谢肇淛说: “盖吾郡缙绅, 多以盐筴起家, 虽致政家居 犹亲估客之事。” [6] (卷15 P305) 又如 福州许天放是翰林 他与亲家商量合伙做生意: “现接开东街一间当店 本钱一万, 汝来合伙, 一人出银五千, 汝再对三千, 得息均分。” [23] (下册 P387) 有钱人家开大店,

小市民开小店。福州城大街小巷分布着许多商店。福州的古代评话说道: “横洋巷口酒米店 惠泽境内选棕毛”, “洋楼口店铸铜锣, 茶亭粉店多热闹”, “斗中街一派制头梳 月片池中铜钻店。”这些商店不少是亦工亦商, 前门卖货 内厅加工。如《闽都别记》第 359 回记载了一个油烛店 一日有一自称为老板娘表兄的人 “闻表妹店中十分兴旺 欲来帮伙 带有些须银来帮搭店中 只学作烛手艺” [23] (下册 P31)。可见, 这家店在买油烛的同时, 还兼制油烛。又如第 287 回安泰桥的玉器古玩店 除买玉器古玩之外, 店内也制造各种玉器。这种类型的店很多, 清代梁章钜说 “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 [24] (卷2 P30) 郭柏苍《闽产录异》也写道: “福州有纸房三四十所, 以扣纸染花笺 研蜡则成蜡笺。”这类店都是亦工亦商的店铺。许多福州人年青时使成为商店的学徒 而后渐渐成为商人。如《闽都别记》中的徐得兴、俞百均 “二人都是十五六岁时, 并在福州鼓楼前药材店学艺”, 后来 俞百均得了一千两银子, 即与故友徐得兴作伙计, “在福州鼓楼前开药材店” [23] (上册 P86、P89)。可见, 普通市民将儿子送去当学徒, 是一条最常见的谋生之路。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 普通福州人将成为大商人当作自己的理想, 许多人因经营得当而成为巨商。在《闽都别记》一书内, 福州怀德坊有一家姓樊的小商人, 主人 “凤鸣为绒线行牙人, 长子站丝线店, 次子学打线艺”。“因家道不足, 将子分开, 只女家中炊爨, 自开卖丝线小店。不是大市头 少人来买。凤鸣常出去为牙人, 惟女在店后门口, 作丝线兼守店。”此女与学校新生许嘉云恋爱, 怀孕后许嘉云死去, 这类事情在当时算是辱没门风的事件。但其父樊凤鸣因得女儿献上许嘉云的千金, 回答女儿: “莫说有千金相赠 只富贵之门面, 亦光我门风, 那有不喜之理!”其后樊凤鸣经营有方, “将此千余金造货, 未过月份, 便得大价。又造别帮, 即刻转为大造户。” “未二三年, 凤鸣在南大街买大店, 开绒线店。” [23] (下册 P360-362) 《闽都别记》一书对樊凤鸣的经商才华大加赞扬, 并充满感情地歌颂商人阶层 这在传统小说中并不多见。

为了经商成功, 福州人养成了跑码头的风俗。樊凤鸣虽然发了财, 仍将几个儿子打发去外地经商, “次子、三子区去泉州开店”。泉州的市面上有不少福州人, “两边街有长乐、福清人开光饼店,

① 道需为霖, 河口万寿桥碑记。此碑现立于福州于山王天君庙内。

亦有连江、罗源人合开老酒店，古田人开红曲米店”[23]（下册，P364-365）。其时，福州与闽江上游的贸易最为兴盛，由建宁府、邵武府、延平府及汀州府北部运来的各类山货都在福州南台屯积，然后转卖到沿海各地，所以，福州人常到闽西北经商为生。《闽都别记》第31回记载，福州人俞百均和莫姓朋友到建州开药店，另有徐得兴到邵武府建宁县药材店做生意。[23]（上册，P180-181）实际上，闽北各地都有福州人开的会馆，而且“三山会馆”往往是当地最大的会馆，我在浦城县、邵武县、建瓯县等县都见到过三山会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邵武和坪镇、顺昌洋口镇及武夷山市的下梅村与星村镇，都有规模不凡的三山会馆，说明当时的福州商人深入闽北的市镇，并在当地很有影响。

南台的行商与沿海各省也有关系，如南台的支家，“为杉木行牙依，家道颇丰”[23]（下册，P28）。常有商人找他购木，“此客要买大扛木数十条，来问支大哥可有么？支翁曰：前月才被宁波客尽贩去，一条亦无，待有运至来看”[23]（下册，P32）。福建运往江南的材木大都要在宁波转站，所以，有些福州商人还到宁波去开木行，然后批销江南各地。如福州人危而亨“在浙江宁波与人合伙开杉木行”，他曾“带三千余银来福州盘贩杉木”[23]（上册，P208）。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古代福州和江南之间的贸易特别盛行。福州有不少商人专跑这条线路。《闽都别记》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林保，原为木匠，后来“得工资回来，遂与妻计议改图别业，帮搭乡人行商船往苏州作客”[23]（上册，P102）。他“往来江苏贸易十余年”，积有万贯家资[23]（上册，P25）。又如第331回记载，某人的舅舅“手中做有数千家当”，其侄说他“舅自失明后，苏州不能去，生意去若干？”可见，他也是个专跑苏州的商人。再如266回，刘鹤龄的乃兄亦是专跑苏州做买卖的。《闽都别记》记载了台江的大行商吴光，他从国外输入无数的珍宝，仅一条船上即载有：“奇楠香五百斤、人参六百斤、燕窝一千斤、珍珠大小三斛、珊瑚长短二十四树，其余珍奇珠宝无数。”[23]（上册，P333）这么多的珍宝当然不是福建本省市场所能消费得了的。因而，他的商船一年跑国外进货，一年跑国内各码头推销。在国内诸名城，他特别重视淮扬各城市，派了“次子鸿济、三子鸿韬、四子鸿略在淮安坐庄，料理十六间行务”，投入了家族的主要力量[23]（上册，P222）。

参考文献:

[1] (明)喻政. 福州府志[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跑码头的习俗使福州人养成了海外冒险的品格。自明清以来，福州人到海外经商已经成为习惯。“闽巷少年，仰机利泛溟渤，危身取给，不避刀锯之诛，走死地如鶩者，徼重获也”[6]（卷9 P5）。“福清僻在海隅，户口最繁，食土之毛十才给二三，故其民半逐工商为生”[23]（卷10 P238）。当时有人将福清商人与徽商相比，如谢肇淛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6]（卷4 P102）。《闽都别记》中记载了不少福州商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如林仁翰、吴云程等人的远航历经几十个国家，备尝艰险，在海上漂流数十年后，才得以返回家乡；又如216回所载的郝元等六人，被暴风漂至异乡，在异国生活了四五十年，子孙繁衍至六十四人，后造大船，衣锦返乡。透过这些故事迷人的色彩，我们看到，古代福州商人和海外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扶余国“该国离中华甚远，闻木船至便喜”，后来，国王欲以御妹太平春召吴云程为夫[23]（中册，P73-178）。古代福州商人的海外贸易也和各国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如五代时，福州长乐军正使祝长安去渤泥国经商，“船碰礁凿破，货没人存，向国王借二千置货回，得利。又装货，带子晓烟至渤泥入澳，船又打破，货又尽没。又向王借本，因不借，将子晓烟送进为质。又借五千银，装货来中国发了。复至渤泥，王知获息无几，不待开言，又发银五千与之，置货往返回，得息数倍，遂加息还本，与王贖子”[23]（中册，P267）。祝长安四经波折，才赚到利润，没有渤泥国王的支持，他早已破产。长期的海外冒险，使福州商人视四海为家，《闽都别记》主角之一铁麻姑在远航前对亲人说道：“万里不为远，三年不算迟，总在乾坤内，何须叹别离。”[23]（中册，P582）这首豪迈的诗充分反应了福州商人勇于冒险的精神。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福建、台湾商业的发展，使福州成长一个仅次于广州的沿海大都市，市内工商业极为繁荣。福州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养成了重商的习俗。不论是儒者还是大官僚，为了谋生，都开张商店。小市民从小在商店做学徒，成人后以经商为生。为了谋生，他们跑遍了省内各地，在沿海许多城市也建立了三山会馆。他们还向海外发展，富有开拓精神，这类精神值得后世继承发展。

[2] (明)王应山. 闽大记[Q]. 福州: 福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手抄本.

[3] (明)何乔远. 闽书[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4] (葡)伯来拉·克路士. 南明行纪[M]. 何高济, 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

[5] 佚名. 明英宗实录[Q]. 台 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

[6] (明)谢肇淛. 五杂俎[Z]. 台 北: 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7.

[7] (葡)拉达. 出使福建记, 南明行纪[M]. 何高济, 译. 台 北: 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3

[8] (明)王应山. 闽都记[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9] 林枫. 榕城考古略[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10] (明)王世懋. 闽部疏[M]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第 3161 册.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7.

[11] (明)谢肇淛. 小草斋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第 170 册[Z].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12] (明)林谦. 洪山桥记[Q] /(清)陈寿祺. 福建通志. 台 北: 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同治十年刊本, 1990

[13] (明)林垵. 福州府志[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4] (明)延陵处士. 商贾买卖指南[Q]. 明潭邑余文台梓行本.

[15] (明)董应举. 崇相集[Q]. 民国十七年重刊本, 不分卷.

[16] 海外散人. 榕城纪闻[Q]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清史资料: 第一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7] (清)林雨化. 林希五诗文集[Q]. 清道光十年刻本.

[18] (清)朱景星. 郑祖庚. 闽县乡土志[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19]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0] (清)郑儒生. 闽广记[Q]. 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21] (明清)许旭. 闽中纪略[Q]. 清道光吴江沈氏刻本.

[22] (明)张瀚. 松窗梦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3] (清)里人何求. 闽都别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24] (清)梁章钜. 归田琐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5] (明)叶向高. 论本邑禁余仓粮书[Q]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 2006

The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ercantile Custom of the City
of Fuzhou During Ming & Qing Dynasty

XU Xiaowang
(Fujian Academy of Science Fuzhou Fujian 330013)

Abstract During Ming & Qing Dynasty the industry of Fuzhou had a growing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the city expanded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harbour cities Fuzhou had become the second flourishest city among the southeast cities only behind Guangzhou The local people mainly lived on business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usiness To make a living they traveled around the province of Fujian and other cities around the southeast coast Those Assembly Halls in each city are the evidence of their success It is no denying that the People lived in Fuzhou has the spirit of exploring

Key words: Fuzhou city Ming & Qing dynasty mercantile custom

(责任编辑: 金 甦)